理论·新论

投稿邮箱：hnrbllxl@163.com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

两个答案：永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册的独特创造

刘建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回答好的根本问题。就此，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找到‘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五中全会《决定》指出：“找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两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永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册。”深刻认识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在探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进程中形成的“两个答案”，对正确把握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

如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来防止公权私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从党的一大纲领规定的要对党的工作进行“最严格的监督”到党的七大对设立“党的监察机关”的专门规定，从中央苏区设立的方便人民群众对苏维埃工作进行批评和监督的“工农通讯员”“突击队”“轻骑队”到陕甘宁边区“三三制”原则基础上的参议会制度，从党中央1928年发出《巡视条例》通告、1931年正式颁布《中央巡视条例》到1949年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等，都表明监督工作一直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1934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并强调“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1937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942年3月，他讲到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时说，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挥各种监督的合力作用。他强调在监督的过程中，既要进行上下监督，也要进行内外监督，要做到“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他说：“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正是有了长期开展监督的实践探索和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才会在“窑洞对”时，充满自信地给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历史上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因权力迷失自我现象的重新上演，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因陷入松散、懈怠和贪腐而导致失败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找到“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担当、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紧紧围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焕然一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党在新时代的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了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通过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的正确道路。

一是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对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突破，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纠正“四风”，使党的作风建设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二是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全方位扎细扎密扎牢制度的笼子，着力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的难题，使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切实做到了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须问责、违法必追究，有效防止了“破窗效应”，使铁规发力、禁令生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三是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与信任爱护干部统一起来，把握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实现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纪律规矩更加严明，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日益强化，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接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

四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正风肃纪和反腐败斗争，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打虎”“拍蝇”“猎狐”一起抓，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织就了反腐败斗争的“天罗地网”，反腐败斗争力度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

五是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把持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切实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不断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谋划、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形成一体推进、同向发力、统筹联动的强大合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之路。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机制是强大的、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有办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条道路、这套制度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成果和宝贵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科学回答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成果，深刻揭示了建设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两个答案”这样的伟大成果，之所以能够成就这样的独特创造，从根本上说，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决定的，是我们党毫不动摇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结果。

一是由共产党不谋私利的内在政治本性决定的。我们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任何同整个阶级和民族利益不同的任何特殊利益，始终同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内在政治本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谋求私利、不谋求特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探索出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成功道路的根据所在。

二是由共产党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初心使命决定的。初心彰显宗旨，使命呼唤担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共产党人拥有了克服自己身上一切弊端和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的巨大勇气和无畏气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百余年奋斗中，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从而拥有了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和最根本的力量。

三是由共产党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决定的。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法宝，也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中始终不自满、不松劲、不懈怠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的强烈忧患意识，造就了我们党立志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高度自觉和使命担当。

把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是永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册的独特创造。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增强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大力破除潜规则

王远征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出部署，强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执行力，大力破除潜规则”。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增强法规制度执行力，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推动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既要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要增强制度执行力，以明规则的刚性力量破除潜规则，充分释放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效能，为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什么是“潜规则”？就是明文规定之外，那套不成文、不公开，大家却心照不宣的行事规则。一段时期以来，各类潜规则在部分领域不同程度存在，其本质是正式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执行落差相互交织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立明规矩、破潜规则”的辩证关系，破除潜规则不能仅靠思想教育，归根结底要靠强有力的制度执行，要把制度的执行和监督贯穿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

编密、扎紧遏制潜规则的制度笼子。“明规矩不彰，潜规则必然盛行”，必须加强系统集成，使制度建设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配套，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不断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党章是全党的根本行为规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必须始终把党章作为管党治党的总依据，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补齐制度供给短板，提升制度设计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厘清权责边界，压缩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从源头上铲除潜规则生存土壤。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持续推进党务公开，推动决策过程、办事流程公开透明，让明规矩立得住、潜规则“见光死”。要常态化加强纪律规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制度思维，形成尊崇制度、敬畏制度的思想自觉，实现从制度认知向制度认同转化。

加强制度执行监督问责。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制度没有特殊、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增强制度执行力，就是要加强和完善监督问责机制，贯通纪律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力量，把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对漠视制度、规避制度、搞潜规则的行为要坚持抓早抓小、动真碰硬，坚决破除执行中“法不责众”“看人下菜碟”等偏差。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0752起、处理375604人，这组数字本身就是最有力的震慑。通过刚性制度约束，坚决扭转部分党员干部“信关系不信制度、信默契不信条文”的错误倾向，引导党员干部把依规用权、依规办事转化为行动自觉。

以人工智能新技术赋能制度执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破解制度执行难点、治理潜规则提供了新的更有效的技术工具，其可以把制度规范转化为数字化运行流程，最大限度减少人情、关系等人为因素对权力运行的干预。依托智能监督平台，实现业务工作全流程留痕管理，实现权力运行节点的可追溯、可核验，进一步压缩暗箱操作空间；运用大数据比对、智能模型预警，对制度落实情况开展动态评估，及时识别制度执行变形走样的苗头隐患，推动监督模式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和事中纠偏延伸。要坚持技术向善，把人工智能技术逻辑嵌入党内法规制度框架之下，实现技术工具与制度规范有机融合，增强制度执行效能，为破除各类潜规则提供数字化和智能化支撑。

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要以严密的制度体系筑牢根基，以刚性的执行效能树立权威，以先进的技术赋能优化治理，持续破除各类潜规则，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作者系中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湖南省高校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资助项目“依规治党视域下高校党的组织制度执行效能研究”（25E01）阶段性成果】

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

周波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握其形成逻辑，可从理论、文化、历史、实践四个维度来理解。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直接理论源头。在根本立场上，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将“人民至上”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在核心主张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等基本规定；在思想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新时代，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等论断拓展了理论深度；理论主题从党“如何建立和巩固政权”深化为“如何在长期执政中永葆生机活力”；理论叙事以“两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

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深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一是汲取古老智慧。古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逻辑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思想启示；“自省”“慎独”等修身理念与一体推进“三不腐”内在相通；“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整体观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方法论启示。二是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民本思想升华为“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在自我革命实践中深度激活，实现了从文化基因到党建品格的跨越。

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于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深刻总结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这一告诫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自我革命、丧失自我净化能力，就可能丧失执政地位，甚至亡党亡国。另一方面，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经验。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创性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再到新时代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了理论体系的系统集成与创新升华。在此基础上，郑重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擘画。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实践逻辑：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实践，是管党治党鲜活经验的规律性升华。一是应对管党治党形势变化。进入新时代，制度供给与治理需求之间矛盾凸显，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效化解风险挑战。二是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六个如何始终”无先例可循、无定法可依，唯有立足中国实际独立探索，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六个如何始终”作出系统回答。三是源于长期深厚实践。从正定到福建、浙江、上海，习近平同志不同时期的从政实践为这一思想提供了源头活水；中央八项规定破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发展等重大实践，为思想系统化提供了现实根基，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跃升。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生动体现，是真理力量、文化底蕴、历史镜鉴和时代要求的有机融合。理论铸魂脉，文化扎根脉，历史供镜鉴，实践赋动能。我们要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切实把握其内在逻辑、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系中共浏阳市委党校（行政学校）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新论

思想经纬

修心立命：千秋伟业的基石

周德义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增强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并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立为根本途径，为新时代党员、干部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指明了方向。这一部署既承续中华文化“安心立命”的深厚传统，又赋予党性修养以鲜明的时代内涵与实践指向。

从“心学”视角把握党性的内在自觉。将党性教育喻为共产党人的“心学”，不是简单比附传统心性之学，而是强调党性不能止步于外在规范与纪律约束，必须内化为党员的精神自觉与价值定力。

其一，党性与内心自觉。党性是共产党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心”则是党性在主体精神世界中的自觉安顿。共产党人“心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有机契合，将党性教育比喻为“心学”，既强调关注党员的精神世界、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也强调把党性教育作为一门学问认真对待。心正，则党性纯；心明，则方向清。

其二，党性与民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性根本属性是人民性，不在封闭自省中生成，而在为民造福的实践中确认。脱离民心，党性成无根之木；不以党性引领，民意难聚为历史力量。修养落脚点，就是守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共产党人“心学”的具体意蕴。初心与本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共产党人的“心学”首先是“党的初心、使命之学”。初心回答的是“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的问题，本心回答的是“在任何境遇中守住什么”的问题。将此引入共产党人的心学，可以这样理解：初心是历史起点上的政治承诺，本心则是经过长期党性锤炼之后沉淀下来的“诚明”状态。不因境遇变迁而改其志，不因利害得失而易其守。初心与本心的统一，使党心既有历史的纵深，又有当下的定力。

信仰与理论铸魂。共产党人“心学”的文化意蕴归结为对党员精神世界、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的根本关注，其深层指向就是信仰的“心安”问题。心安则理得。信仰的功能，正在于为党性修养提供一种超越个体得失的“安顿”，使党员在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时，仍然能够从信仰中获得判断的尺度和坚持的勇气。理论既是指南，也是精神依归。

人民性、实践性、先进性品格。党心的内容不是静态的条目，而是在品格中呈现出来的动态结构。人民性是党心的价值底色，决定了党心“为谁而立”；实践性是党心的存在方式，党心不在静观冥想中生成，而在“事上磨炼”中养成；先进性是党心的历史要求，要求党心不能停留在既有水平，而必须随时代任务的变化不断升华。

修好共产党人“心学”的遵循。修心不是脱离实践的“向内收敛”，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以人民为中心，是修好共产党人“心学”的价值轴心。“以百姓心为心”不是抽象的道德宣示，而是要求把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党心的感知对象，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党心的根本尺度。党心只有在对民心的持续体认中，才能保持温度与方向。

实事求是，是修好共产党人“心学”的认识论要求。党性修养最容易失守的时刻，往往不是面临外部压力之时，而是主观愿望脱离客观实际之日。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对现实的开放性。“以心正为本，以治心为先”，而“正心”的前提在于“明其性”，即保持心与世界之间认知通道的通畅。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正是党心避免僵化、保持清醒的认识论保障。

廉洁自律，是修好共产党人“心学”的底线所在。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把增强党性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本身就包含了对廉洁底线的刚性要求。廉洁不仅是行为层面的“不敢”“不能”，更是党心层面的“不想”。当党心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良心”之所系，以信仰的纯洁为“天理”之所在，廉洁便从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秩序。“养心重在养气”，在共产党人的语境中，这种“气”可以理解为“浩然正气”，一种不为私欲所俘获、不为权力所腐蚀的精神气节。

修心功夫：立心、养心、治心的统一。立为民初心、立实干恒心、立长远公心。立心不是一次性的“宣誓”，而是在每一个重大抉择关口重新确认“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持续行动。

养心，是修好共产党人“心学”日常滋养与积累。以“养气”释“养心”，共产党人的养心，就是在理论学习、组织生活、群众工作与自我反省中，持续涵养对人民的感情、对真理的敬畏、对纪律的尊重。养心没有捷径，它依赖日复一日的“事上磨炼”。

治心，是修好共产党人“心学”的自我纠治与净化。心不能只养不治；养而不治，则私欲可能悄然滋长而主体不自知。治心意味着以党性原则为镜，以人民立场为尺，以实事求是为法，对可能出现的偏差、懈怠与私念进行持续检视与校正。立心为养心提供方向，养心为治心积累底气，治心又反过来巩固和纯化立心与养心的成果。三者构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修养过程。

“修心立命”的最终指向，不是个体的道德自足，而是千秋伟业的精神根基。中国共产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放松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改造。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所部署的共产党人“心学”建构为依归，持之以恒的修心功夫便获得了双重意义：对党员个体而言，它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对党的事业而言，它是千秋伟业最深沉的基石。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